

編

编辑史概要

申非著

輯



国防大学 2 062 5342 7

编辑史概要

申非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060号



国防大学 2 062 5342 7

编辑史概要

申非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32开本 6.25印张 137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5.80元
ISBN 7-109-03450-X/Z·125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讲述编书历史的参考书。本书以总述和专题两部分，系统地简明地论述了从孔子到现代我国图书编辑的历史。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编辑与文化、编辑与出版业的关系，编辑工作的基本性质，以及我国图书编辑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专题论述有：经学书、史学书、文学书、科技书、字书、类书、丛书等方面编纂的历史经验，以及常见于古籍中的注释和凡例的编撰工作。本书论述系统，内容丰富，材料详实，可供文化工作者参考。

前 言

写史一般是按时代顺序，年经事纬。这本书如按此法写去，每个时期便不能不介绍其文化活动的历史背景，这难免与他书雷同，会过多地占用读者时间，而且编辑工作中各项专门问题的发展过程，时代上交叉重复，眉目难清。因此，从纪事本末体史书得到启示，采取分列专题的写法，事经年纬，每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依年代勾画，便于说明。这仅是一种尝试，未必得当，还望读者予以指正。

著 者

目 次

前言

总述部分	1
编辑与文化	1
编辑与出版业	3
编辑工作性质	7
图书编辑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11
专题部分	16
孔子和五经	16
史书四体	31
诗文总集和别集	53
科技古籍	64
字书的流变	83
类书编纂	114
古籍丛书	130
佚书纂辑	143
古籍传注	158
凡例源流	171

总述部分

编辑与文化

编辑应社会之所需，把人类所创造的知识组织成多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形成多种类型的精神产品，以满足各行业、各层次的读者对知识的探求。这些编辑成果，以知识载体的形式，充实读者知识领域的空缺，引导读者探求知识的取向，并且不限于一代一世，而是历代相沿，成为绵延不断的社会存在，有力地促进着文化的发展。

孔子把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整理成《五经》，不只用以教育当代的门人弟子，而且垂教后世，传之万代。其所阐扬的人生哲理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奉之为整个民族的社会行为规范，甚至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固然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但所编图书凝集着的文化价值是不容低估的，正确地看取它的积极因素也是现代文明建设所必需。

西汉末，刘向把流传下来的各种图书进行一番整理，经过他校订、厘正、重编，使之形成顺理成章的定本。今日所见的《楚辞》《战国策》等都是经他亲手编定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也是他采录古书，辑撰之作。他以图书分类、图书整理事业奠基人的地位耸立在中国文化史上。

由西周史籀开始编成学童必读的识字课本《史籀篇》，到

东汉许慎撰成体例完备的字典《说文解字》，之后，历代都有新的字典、词书编成，像滚雪球一样，一代比一代扩大，一代比一代充实，到清代而有《康熙字典》，到民国而有《中华大字典》，到新中国而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一代代的文化里程碑，恰如一层层迭起增高的宏伟大厦。

把零散的史料文献缀辑成有系统的史书，从《尚书》《春秋》《左传》到《史记》《汉书》以至《通典》《通志》《通考》，这一系列记载民族历史事迹的图书，展示着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发展轨迹，只要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无不把这些文化遗产视为珍宝。而这里边也无不凝聚着历代史书编撰家的心血。

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同被视为古籍名注。他们引书千百部，用以解释词语，说明文意，补充事实，在古籍与今人之间架起桥梁，使古籍与今人相通，从而使僵化了的东西获得新的生机，重新发挥启迪人们心灵的作用。同时，在注释中保存了不少失传古籍的内容，因而还起到积累文化的作用。众多古籍的广大的历代注释家，在这方面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历代著名的编辑家们，编成各种类书、丛书，不仅在当代发挥了传播文化、教育人才的作用，流传至今，仍然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因此，可以肯定，编辑工作绝不是“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小技，更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缝工。他们是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工程师，是文化财富创造者群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编辑的服务对象是图书的最终消费者——读者。为读者着想，是古往今来一切编辑工作的核心。

读者无不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只有对此有充分的理解和掌握，才能编出文采赡丽的图书，卓有成效地充实他们，引导他们。

读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一切文化生根、滋长、繁茂的沃土，是文化生命源泉所在；他们的反应暗示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不是文化信息的消极的接受者，只有在他们的参与之下，文化才能有勃勃的生机。

读者接受信息于当代或前代的编书人；他们的读后感应，反馈给当代或后世的编书人，使编辑事业更好地与读者需求联结在一起。因此，编辑工作中的各个环节，都必须牢牢掌握“为读者”的思想，以此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由它来制约着整个编辑工作过程。

作者，一切有所发明创造的人，是知识财富的第一创造者，但这些知识如果没有编辑为之赋以多彩多姿的存在形态，便不会广泛地深入人心，成为一代人一代人共同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是读者、编者、作者共同促进和发展着图书事业。

编辑历史的无数事实，有力地说明，编辑所从事的一切是图书文化事业的中坚，研究和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对文化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编辑与出版业

编辑工作与出版业各自起步于不同的时期，它们之间既

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

在以经售书籍为营生的出版业出现之前，编辑工作作为图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已存在。那时编辑所从事的是缀文成书，或将分散的单篇文献集中起来编次成书，或将散见于多种文献之中的知识素材加以重新组合而成一新的著作。这个时期，书籍的流通是靠原始的个人之间的传递，并无出版业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而从事编纂图书的人则分散地存在于各自所属的行业之中。

在出版业（先是经营抄本，后来经营刊本）形成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图书编纂人与出版业者，仍然是各自独立，不相统属的；只是在以机械印刷为主的现代出版业形成之后，才出现专属于出版机构之内的编辑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并不完全取代原来散在于社会各个行业之中的图书编纂人，他们是处于传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中介地位，以复制原稿的方式把编著者（传者）的精神产品通过市场传播给读者（受传者），其主要任务是组织著作出版，对原稿进行选题的拟定，内容的审读和加工，图书整体的装帧设计，使原书稿符合出版规范而付诸印制和传播。

我国的出版业大致可分为：①出版业形成之前的时期，书籍的流布以传抄为主，约在周秦以至西汉；②出版业萌芽时期，以经营古典名篇的手抄本为主，大体为东汉至隋、唐；③出版业逐步兴盛的时期，以经营雕版印制的刊本为主，约为五代以至宋元明清；④近现代出版业兴起的时期，清代末叶以来以活版机械印刷为主；⑤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电子技术的出版时期。

出版业尚未形成之前，书籍作为知识载体是以传抄方式在社会上流布的。《史记》在《吕不韦传》中提到：“是时诸

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可知战国时期九流百家的言论文章已在社会辗转抄录。到了秦代、西汉，这种传抄方式仍然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秦皇之识韩非，汉武之识司马相如，都是先看到传录来的他们的文章，然后才访求其人。

经售手抄本的书肆，最早可能出现于西汉后期。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的著作《法言》曾把好读书而不明儒家要旨的人比喻为“书肆”。东汉初期王充（公元27—97？）的时代，京城有市肆售书已极明确。《后汉书·王充传》称：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精通众流百家之言。”东汉后期的荀悦（公元148—209），其本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父早卒，家贫无书，每之市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这种经售手抄本的书肆，经魏晋以至隋唐，逐渐由通都发展到僻邑。据《新唐书·儒学传》载，隋文帝时的太学博士徐文远，年少时家中遭变故，徙居河南偃师，“贫不能自给，其兄文林鬻书于肆，文远日到书肆阅读，因而博通五经。”这时书肆所售抄本多为儒家经典和众流百家之言，至于当代人的著作极为罕见。王充所著《论衡》，一时并不为人所知，在他死后八九十年，蔡邕、王朗先后从王充故乡得到此书抄本，秘藏阅读，用为谈助，才逐渐引起世人重视。唐朝中期的白居易（公元772—846），他的诗集排纂成书后，请人抄写数份，分别藏于洛阳圣善寺、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香山寺，以备流传。当时白诗已广为各地士庶所吟诵，但并无书肆为之抄录出售，不得不自己设法保存以待传布。（白氏在世时，即有日本留学僧徒从南禅寺抄录全书带回日本，因而白诗在日本流传最广。）这可说明，当时书肆业（经售手抄本的出版业）还不

昌盛，通过市售的传播还远远落后于读者的自行抄录。

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末，五代时期已正式用雕版印刷经籍，宋代以后经营出版业的书舖在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地有很大发展。书肆的发展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读书需求的增长，同时，书肆的经营范围也随之扩大。不仅要刊刻古典名籍，而且也刊刻时人著述。当时有些儒林士人著书编书，出版经营者本人有的也校书编书。据《四库全书》著录，宋代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建阳书贾魏仲举就亲自编辑刊刻了《五百家注韩先生文集》《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韩柳年谱》等书。清初经营汲古阁的著名出版家毛晋，所刊刻的著名典籍多请文名很高的学者代为校勘，使成善本。《儒林外史》虽属小说，其中所述冯二先生和匡超人应书贾重金聘请，代为选编批注应试文章选萃的事例，也应该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事例说明，在雕版印刷盛行时期，出版业的经营者的，除刻书售书外，有的自己从事编辑，有的请人临时代为编辑，书舖本身并无聘请长期专门从事编辑的人员。清代末期，近代出版业出现，才将印制、销售和编辑熔为一体。但前文所述各项编纂任务范围极广，出版机构本身难以包容全面，欲求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没有社会上多方面的专家与之协作是办不到的。

现代的出版业，是以工业化社会和世界性信息传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产品品种多，数量大，流通快，更新快，学科分工细密，图书门类和图书造型繁富多彩。因此，它需要集中大批专职编辑人才，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以适应社会快速前进的步伐。而他们的工作重点，常常侧重在开发新选题、新品种方面，以不失时机地传播新学说、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但是出版业内尽管拥有一批专职的编辑队伍，

但他们并不能把编辑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揽无遗，事实上仍须由出版业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专家协同努力，分担部分工作，其中有些甚至是带指导性的、关键性的，如邀请出版界外的专家担任编委、评审顾问等等。因此，出版机构必须开门办事业，才能很好地完成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的职责。

编辑工作性质

编辑工作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活动，自有它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这方面加以考察，不难探明它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从我国图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考察，可以认为自有成形的图书出现，便有编辑工作的存在。换言之，编辑是随着图书的形成和传布而必然产生的，它的出现有其客观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早期的编辑工作常常是由作者兼而为之，编辑性的活动为撰著性的活动所掩盖，因而不为人们所重视。随着历史的推移，科学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编辑工作逐渐从作者分化出来，显示了它特有的个性。于是，人们逐渐认识到编辑工作是与撰著工作性质相近而又有区别，相辅相成而又相对独立的一项专业性工作。

这项专业工作在历代的经验积累中，在它的各个侧面与各个具体环节，不断出现新的创造、新的理论。继承这些理论，尤其是结合现代的编辑工作实践发展这些理论，使之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是现代出版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我国第一代大编辑家孔子的“述而不作”，即“传述成说而不自立新义”，说明了编辑与撰著的区别。他的“述”，当然也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简单的传述。首先包括对用作教材的自古传承下来的文献加以整理编修，这几乎是古今一切编辑工作的出发点。为什么要加以编修呢？它的必要性在哪里？根据我国图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大体上可以说，这是由图书作为社会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亦即为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因此，编辑工作的内容与方法，也为图书的这个社会属性所制约。

这里说的图书的形成与传布，不是指稿本的形成，也不是指供个人自用或某个集体自用的文书、记录等等，而是指供社会公众阅读、利用的出版物（包括早期的手抄本）。个人或集体的自用文书，个人创作的文稿，都属私用文献，一旦它们转化为向公众传布的图书，它的私的性格便转化为公的性格，成为社会公众中一切有条件的人都可享有和利用的社会化的精神财富。从而使它由稿本所载知识的私有形式上升为社会共享的公有形式。因此，著作一旦形成图书，它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它已不是供个人享用或欣赏的作品，而是社会用以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培育人才的手段。为此，图书的形成便被赋与了某些必不可少的特征：

1. 图书必须是社会有用知识的载体。

2. 图书的内容结构、表达方式和方法，必须为社会公众（某些相应的读者群）所能理解和接受。

3. 图书的总体造型，必须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工艺同步；在满足图书可供反复阅读、便于传布、保存及其他利用方面，达到当代出版规范的要求。

以上三点是出于图书的社会属性的要求，也就是从社会对图书的要求的角度产生出来的。著作者的任务在于将其科学、艺术上的发现或发明书写成文稿，而文稿的形或与图书的形成之间还存在着一段间隔。如何填补这个间隔，使图书的形成臻于完善，以符合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培育人才的社会需要，则属编辑工作的机能。

这个间隔来源于上面所述图书的社会属性的基本特征。其一，何者为社会有用知识的载体，存在一个鉴别评定、选择取舍的问题；其二，如何能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存在一个整理编修、加工润饰，增益其可读性的问题；其三，如何符合出版规范，存在一个设计加工，增益其可用性的问题。具体地说，

1. 文献资料或私人著述转化为社会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需要经过鉴别选择，定其去取和整理加工的步骤，然后才好公之于众。编辑工作便是代表社会来完成这一步骤，履行这样一种社会机能的。我国第一批流传至今的完整的图书，如《易》、《书》、《诗》、《礼》、《春秋》，都是由散在的或不成系统的文献资料，经过考正、删取、修赞、编次而成的。这一事实也说明，编辑工作在历史上是与图书的形成同时产生的。至于个人著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大都是由他们的门人或再传弟子整理成书的。我国早期的雕版图书，无论官刻或私刻，无论无偿传播（公家颁布）或有偿传播（私家市贩），也都须经任其事者有计划地筛选，定其去取。为他们选中者，自然是主观上认为于社会有用，有利于传播知识、培育人才。当然有用也是相对的。时移世易，有用会变为无用。即在同一历史时期，有用性也只能局限在某种范围之内，受阶级利益的制约。

图书的有用性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九流百家著述纷繁，当时书籍尚未成为商品，而且又是竹帛手写，其所以能传流于世，主要是读者认为有用才不惜工本抄录备用。秦皇虽下令焚书，先秦典籍还是有不少流传了下来。后来历代的著述流传至今的，据说约为百分之一二。从中可以看出，图书能否流传，主要是由它对社会的有用性如何而定。因此，当图书纳入社会传播轨道之前，对其有用性作严格的考察评定，是很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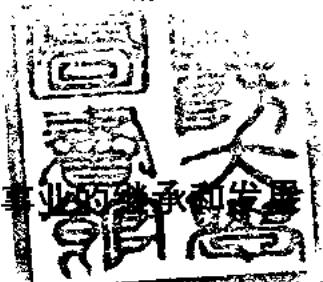
2. 著者在撰述作品时，往往倾注其心力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思想、感情，尽管也注意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但客观上难免存在着某些疏失和缺陷，或因对读者缺乏了解，所写文章与群众的理解力水平存在着差距。作为社会性的精神产品来说，应当尽量使其完善，无所缺谬，充实文彩，增强可读性，照顾读者思考问题的逻辑习惯、对语言文字和科学理论的理解水平，以及他们的读书兴趣，使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得懂，而且愿意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这个间距，往往有赖于出色的编辑工作来填补。

3. 图书总体造型，是出版方面考虑的问题。尽管著者对此寄予关心，但由于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由于社会分工的限制，必须通过细致的编辑工作来促其完成。

据以上所述，对编辑工作的性质，大体可作这样的概括：编辑工作是应图书的形成和传布必然产生的，它具有不同于撰著工作的特定的社会机能，是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一项相对独立的专业性活动；其社会机能在于选定可供出版的文献资料和稿本，从内容和形式上完善图书质量，强化其可读性和有用性，使其符合出版规范，实现传播知识、培育人才的目的。

简要地说，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作者写成的文稿或文件和由它转化而成的社会公有文化财富之间，有着一段似通未通的间隔；这段间隔的空间正是编辑们的用武之地。这好比集散农副产品的行庄，对集拢来的产品进行筛选、打磨、加工、整理、包装，使之符合商品的通行规格，然后投放到市场上去。这空间看似不很宽广，但运用得当，也可演出气势恢宏、精彩感人的戏剧来。特别是当图书市场成为传播文化的主要阵地的情况下，编辑在组织精神产品生产的活动中，将对市场需求，即对读者寻求知识和精神消费的取向上，发挥出积极的导向作用，这在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书编辑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任何文化事业都不可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都有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我国文化昌明较早，图书编辑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有非常宏富的经验。这一切正是我国图书事业及其编辑工作的无形的宝藏，有待我们去发掘、继承，并结合现实条件更好地去发展。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套图书，是由孔子亲手编定的《五经》。孔子聚徒讲学，把西周旧有文献诗、书、礼、乐、易和鲁国春秋，加以整理，经过搜求、考订、修赞、删削，重加编次，使之成为定型的教材，即流传至今的《五经》（乐经散亡，六艺只存五经）。对此，孔子自谓为“述而不作”。可见述所涵盖的内容，即编辑工作的内容，是相当繁富的。